

《西游记》重译者行为模式解读

刘深强¹ 刘珍珍²

(1. 淮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2. 南京大学 全球人文研究院, 江苏 苏州 215163)

摘 要:前译对重译产生影响甚至引发重译者焦虑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继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之后的《西游记》重译者都面临着如何回应《猴:中国民俗故事》这部经典译本以及如何超越这部前译本的问题。余国藩、詹纳尔(W. J. F. Jenner)以及蓝诗玲(Julia Lovell)作为三位较具影响力的重译者,在翻译《西游记》时分别采用了达耶蒙式、苔瑟拉式以及克里纳门式修正模式,以此建构重译本的文学价值。采用以上重译模式与三位译者的学者型译者、政府机构型译者以及市场型译者的角色化历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影响的焦虑;译者角色化;重译行为模式;《西游记》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2-0136-13

0 引言

重译作为翻译不断追求完美的体现,它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已被学界广泛接受,而相关学理研究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学者鲁迅、邹韬奋、茅盾以及周作人等就“重译是否必要”展开了相关学术论争。90 年代安东尼·伯尔曼(Antonie Berman)、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和威廉姆斯(Jenny Williams)、科斯金恩(Kaisa Koskinen)和帕罗博斯基(Outi Paloposki)、奥·德里斯科尔(O' Driscoll)等又围绕重译假设在西方掀起相关研究浪潮。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广涉概念界定、动因、价值、伦理、功能、规范、策略、过程等问题,搭建这样一个叙事:前译存在缺失,重译是为了回应缺失而生,比如误译纠正、章节删减、语言老化、原文新解、隐喻明晰以及风格改善等(Francoise, 2015: 73)。

在这一学术话语体系中,重译与前译被设定为“增补关系”(Robinson, 2009: 27)或者“超越关系”(许渊冲, 1995: 40; 刘晓丽, 1999: 13)。重译取代前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得到

收稿日期: 2024-10-10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余国藩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2023SJYB189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汉学界学者型译者群体行为研究”(22YJC740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深强,男,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刘珍珍,女,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典籍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 刘深强,刘珍珍.《西游记》重译者行为模式解读[J]. 外国语文, 2025(2): 136-148.

了充分论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译在后译者看来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它对后译者及其翻译实践产生了影响。比如罗选民在重译莎士比亚名作《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悲剧》时,就曾表示“几位不可逾越的高山般的莎剧翻译大家”使他顾虑重重(罗选民,2016:73)。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影响与焦虑如影随形,须臾不曾分离。这种影响虽有学者论及(王世钰,2021;陈庆,2022),但关于重译者如何克服前译的影响,取得重译成功的方法研究仍不多见。基于这一现象,本文将引入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影响的焦虑,对《西游记》三位重译者——余国藩、詹纳尔与蓝诗玲的翻译实践展开研究,讨论三位重译者如何在文学主题与形式这两个层面回应前译者的影响,以相应的修正模式来应对前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来填补影响理论原因分析不足的问题,解读《西游记》重译本价值生成的原因。

1 《西游记》强者型译者及其影响

“文坛巨擘”或“业已跻身文坛的强者”往往施予后来者压迫与焦虑,后来者往往处于他们影响的阴影中(布鲁姆,2006:2)。文学翻译实践亦是如此,当一部较具影响力的译本诞生时,重译者往往处于该译作影响的阴影中,并以这部译作为起点开展翻译实践(Poucke,2020:10)。在《西游记》走进英语世界170年的历程中,24位译者推出了各自的译本(吴晓芳,2021:156)。这些译者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阿瑟·韦利,他的译本也因其广泛影响使后译者身处重译的焦虑中。

阿瑟·韦利的节译本《猴:中国民俗故事》(*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在1942年一经出版即斩获了英国最古老文学奖项——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次年由庄台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在美国发行取得巨大成功,并于1942、1943、1944、1945年再版。与此同时,这部译本还被转译为荷兰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近年来,它还被视作《西游记》代表性译作,收入权威文学选集《诺顿世界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中。

韦利对这部作品所持的观念不仅影响了自身的翻译行为,也因其所取得的成功影响了后来者的翻译观念。一方面,韦利将《西游记》小说定位为一部具有娱乐性和消遣性的通俗小说,将主题设定为以“猴王”为中心的英雄历险与成长故事(王文强,2019:115)。这一主题判定既受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通俗美学盛行的影响,也受国内学者胡适认定《西游记》是一部“蕴含深意的一派胡言”这一观点影响(Waley,1943:1)。另一方面,韦利认同西方散体叙事形式,质疑《西游记》中韵文叙事的文学作用与美学价值。他认为“中国小说与

西方小说无法相比,因为中国没有用散文形式写就的小说。东方国家的白话小说是以韵散相间为主要形式,这与我们熟悉的西方小说完全不同”(Waley, 1943: ix-x)。因此,在他看来,这些夹杂在散体叙事中的韵文几乎是“不可译”的,所包含的韵文并无太多文学价值与意义。因为作者吴承恩作为诗人虽然小有名气,但是诗作相当普通,而原小说中的韵文如果翻译成英语,将非常“糟糕”(Waley, 1942: 7)。

在这一观念作用下,韦利对文本主题进行了通俗化翻译。在主题方面,他放弃了对原著宗教寓意的阐释及其拟人化手段的再现(李晖, 2016: 223)。他以“猴”(Monkey)为题,将叙事中心从西行事件转移到人物成长,并根据英雄人物历险这一新主题结构,将原著 100 个章回节译为 30 个章回(保留 1~15、18~19、22、37~39、44~49 和 98~100 章回),将原著单元剧、嵌套、循环与重复的多线叙事结构化作单线、线性叙事结构。整部译作叙事重心置于猴王身世与大闹天宫等章回,师徒取经旅程虽被置于叙事主线中,但却被用以衬托猴王英雄形象,保留的取经章回仅涉及乌鸡国、车迟国以及通天河这三个故事单元。在这三个章回中,猴王机智勇敢,独当一面,更加贴合于主人公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

其次,从文学形式来看,韦利《西游记》翻译实践中最为突出的是去韵化改写。《西游记》原文中穿插了 750 多首韵文,涉及诗、词、曲、赋、骈、古风、歌谣、偈、颂等各式文类。韦利删除了原文中的大部分韵文,只保留了其中 18 首,以韵文的形式展现在译文中。其中第 1、10、22、39 章回都仅保留一首韵文,第 2、5、6 章回选译了两首韵文,第 37 回选译了五首韵文,第 38 回译介了三首韵文,剩余章节未选译任何韵文。此外,选译的韵文也并未全译,有些韵文,比如第 1 回选译的词、第 37 回、第 38 回的七言排律都只节选部分诗行。从韵文选材上来看,韦利所选译的韵文或者韵文片段或是服务于人物形象塑造或是推动叙事情节进程。

这种迎合目的语读者审美期待的译介模式使得韦译本在西方拥有大批读者的同时,也使得此后的《西游记》重译都难逃韦利译本的压制性影响。后来的《西游记》重译者几乎都提及了韦利的这部译作,以及这部译作对自身翻译实践的影响。而凸显猴王英雄形象以及删除韵文的翻译模式在此后 20 年的《西游记》重译实践中也被奉为圭臬,至今仍被认为是《西游记》重译需得遵守的规范。比如,1944 年美籍华人陈智诚与陈智龙完成的 *The Magic Monkey* (《神猴》)、1946 年美籍华人王际真所完成的译文 *The Monkey King* (《猴王》)、1964 年乔治·瑟内尔(George Theiner)转译的 *Monkey King* (《猴王》)等都是以“猴”为题,删除韵文的散体叙事译文。

2 《西游记》重译者的修正模式

如何摆脱前译者影响,建构重译本的价值是重译者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Venuti,

2004:25)。为了应对前辈的影响,布鲁姆提出六种修正比来阐释后来者如何以前辈作品为起点,建构自身作品价值的路径。因此,“修正”实质上就是六种削弱前人影响、壮大新人的技巧(布鲁姆,2006:4)。它是后来者有意回避前人对其创作的影响所运用的各种广义修辞技巧。鉴于不同的互文视角,后来者形成了六种修正模式:克里纳门(Clinamen)、苔瑟拉(Tessera)、克诺西斯(Kenosis)、达耶蒙(Daemonization)、阿斯克西斯(Askesis)和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布鲁姆,2006:preface)。下文将援引其中三种来阐释《西游记》重译者的翻译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讨论的重译模式并非通过某一人名翻译、某一文化专有项翻译或是某一章节翻译与前译的局部互文关系界定的,而是基于重译者对前译者的主题与形式的认知这一宏观互文关系进行判定。

2.1 “达耶蒙”式修正模式

达耶蒙也被译作“魔鬼化”,指的是后来者暗示前者的“相对虚弱”,采用“逆崇高”的强烈方式进行对抗和转化(布鲁姆,2006:76-77)。这种修正模式是对前驱崇高的一种反动,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式的策略。如果用这一概念来诠释重译行为,可以理解为后译者对前译者持质疑、批评甚至矮化的态度,指责前译本的“不足与缺陷”。在这一态度作用下,采取与前译者截然不同的翻译行动,打造甚至前景化重译本的“优势与价值”,使重译本展现出与前译本不同的风貌。在《西游记》众多重译者中,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学、文学教授余国藩即采用了这种重译模式来回应韦利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面对韦利这位成功的前译者,余国藩采用一种质疑与批评的态度来回应这部译本对他的影响。这种态度贯穿了他《西游记》重译、修订以及编译生涯,不仅成为他重译的动因,也是支撑他一系列翻译决策后面的逻辑。在第一版译本的《序言》部分,他就指出:“1943年,这部译本(韦利译本)出版,它的标题——《猴:中国民俗故事》让人误读(原著)。韦利的作品在风格和措辞方面都远胜其他的译者,高度准确,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作品也是高度删节与筛选的节译本……”(Yu,2012:5)在这篇《序言》中,余国藩对西方较具影响力的前译进行了简要梳理,在众多前译中,他对韦利译本的介绍尤为详细。一方面,他详细地罗列韦利译本保留与删掉的章节,向读者透露韦利译本并未忠实地描绘出《西游记》原本的内容,从而指出这部译本因为章节删节所带来的遗憾与缺失。另一方面,他重点强调韦利虽有译诗之才,但却在翻译《西游记》的过程中删除韵文,从而导致整部文学作品形式扭曲,使得吸引数代中国人的语言叙事活力和描写力荡然无存。余国藩对韦译本的批评态度随着他对第一版译本的修订变得更加突出。他强调韦译本的缺陷与不足是他重译的动因。在第二版译文的《序言》中,他指出:“1969年,我决定翻译《西游记》全译本有两重目的:在文学形式层面,我想要纠正阿瑟·韦利通俗节译本所塑造的扭曲景象,它删节了《西游记》

的全部韵文,并且随意删减散文叙事……在小说理解与批评阐释方面,我想要纠正胡适有失偏颇的观点(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这一观点为韦利的版本提供了依据。”(Yu,2012:1)

无论是原文本的主题还是形式,余国藩都持与韦利截然不同的观念。首先,与韦利将小说定位为以“猴王”为中心的通俗小说所不同的是,余国藩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这部小说有一个叙述声音经常压低声调提醒读者:即使乾坤大战、神人异物、怪异经历和身心的非凡跃动等轻松生动的描写,当中也大有寓意在焉(余国藩,2006:308)。它描写的是“通过漫长而危险旅程来寻求真经的事业,已成为一项集体的努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勇敢且饱受折磨的热心人士的辉煌成就”(Yu,2012:12)。因此,小说的主题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这是一出身历其境的冒险犯难的传奇。其次,这也是一则演示佛教业报(karma)与解脱观的故事。最后,小说所涉及的内外修行的哲学与宗教内容,又在说明这是一部寓言(余国藩,2006:342)。

为了展现《西游记》的多层宗教寓言叙事架构,与韦利在文本结构、文化要素等层面采用缩译与删译所不同是,余国藩在各个层面均采用了厚译或是增译来架构起文本的多重主题。比如,在译文正文前添加长篇副文本,涵盖了“历史与文学前作”“文本与作者”“诗歌的用处与来源”“和尚、猴子以及寓言小说”等四个主题。通过对这四个主题的阐发,向读者传达这部文本复杂的宗教架构,促使读者将其视作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深刻思想内涵和严谨架构的严肃文学作品。其次,通过对涉及宗教主题的章节、宗教寓意的语词采用文外加注的方式,开显文本的多重寓意架构。比如第14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中,悟空杀六贼喻指猴王断除阻碍悟道六感的过程。余国藩通过在译文篇首添加文外注“The six robbers or cauras refers to the six senses of the body, which impede enlightenment; hence they appear in this chapter's allegory as bandits”(Yu, 2012:711),点明这一章回的宗教寓意。而对于文内的宗教文化专有项,比如金公、木母、黄婆、摩尼珠、灵龟、金乌等涉及文本宗教主题架构的术语均采用文内解释与文外加注的方式,凸显其宗教韵意,以此阐释原文的宗教寓意。诸如此类通过解释宗教术语、提供背景信息、增加解释性短语甚至运用类比和比喻的明晰化翻译方法(explication)在余译本中俯拾皆是,此处不一一枚举。

再者,从文学形式层面来看,余国藩肯定了《西游记》韵文的诗学与美学价值。首先,他追溯韵散相间叙事模式的文学源头,肯定这种文学形式的叙事优势,以此批驳韦利的散文叙事观。其次,他揭示了韦利为代表的“韵文无价值派”在评价西游诗学时因套用传统抒情诗学准绳所犯下的诗学价值误读。因此,在余国藩看来,《西游记》的作者是“最擅长于叙情写景的诗人中的一位”(余国藩,2006:259)。鉴于这一形式观念的影响,余国藩在翻译《西游记》时,秉持着“复刻文学形式多样性”的原则,向西方读者展示:《西游记》是以

韵散相间的形式展开中国古典叙事,而这些韵文也非单一诗体韵文,它们形式多样,涵盖了诗、词、赋、曲等各类问题。因此,余国藩的译作不仅旨在展示韵散兼具的文学形象,也展现了韵内有别,即诗、词、赋之间的差别。

在此诗学观念作用下,余国藩全译全文 750 余首韵文,将韵文译文单列,行行对译,凸显韵文与散文的文体差异。其次,余国藩的韵文翻译实践表现出“循类而译”特征,即注重在译文中复刻该韵文的文类特征,凸显其与其他韵文文类的差异。比如为凸显词体韵文与其他韵文文类的差异。他不仅在首篇词体韵文译文后添加备注,详细介绍“Lyric”,并在文外加注阐释了“now a conventionalized term to translate a genre of premodern Chinese verse name ci 词, which developed toward the end of the Tang period (907)” (Yu, 2016:705)。这条注解不仅追溯了词的起源,而且介绍了常见词牌以及词的结构与韵律。而对每一首词体韵文,余国藩对其诗学制式进行了详细考察,在译文后添加备注,介绍词体韵文的词牌名。比如第 10 回的词体韵文备注为:“The poem is actually a lyric to the tune of ‘Moon Over West River’.”再者,因诗体韵文有平仄、对仗以及押韵等形式特征,余国藩在翻译诗体韵文时多重在展现音韵特征,在译诗中通过挪用英诗中格律、押韵来处理齐言体诗歌、对句等(荣立宇等,2018:25)。而在翻译赋体韵文时候,余国藩则注重展现句式的长短特征,来再现赋体韵文的形式特征(刘珍珍,2020:107)。由此可见,余国藩在散韵皆译的同时,还能注重韵文亚文类特征的再现,旨在向西方读者展现《西游记》庞杂的文学形式特征。

在达耶蒙式重译模式中,重译者往往依托新的时代背景,对前译本进行批评、质疑与矮化,后来者的身份使得他能够揭示前译本在传递原文本精神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播上所存在的局限性,为新译本的诞生与价值建构提供理据,由此新译本往往更能反映当代读者的需求和审美取向,更具有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

2.2 “苔瑟拉”式修正模式

苔瑟拉源自拉丁语,意为“拼贴”或“补全”。它为迟来者提供了想象力,告诉他们使原来“被截短了的”前期作品和前人得以完整而需要的东西(布鲁姆,2006:51)。它代指后来者对先辈的接受,并通过扩展的方法来补充前辈的作品。后来者将某些方面重新整合和重新定义,使其在新的创作中获得新的意义。如果这一概念带入对重译的描述与界定,可以理解为后译者对前译者翻译观念及作品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承接了前译者的翻译思想,效仿前译者相关翻译行为,但却在其基础上扩展前译者的作品。《西游记》另一部全译本译者英国利兹大学教授、汉学家詹纳尔即是通过苔瑟拉式修正模式,对韦利译本影响予以回应。

与余国藩相同的是,詹纳尔的翻译实践也深受韦利译本的影响。但不同的是,詹纳尔

对韦利及其译本持认同且赞扬的态度。在接受纸托帮(Paper Public)的采访时,他曾坦言正是受韦译本的影响,他才开启了中国文字、文学及历史学习历程。“12 岁的时候,母亲从教堂二手售卖会上带回来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韦利所译的《猴》。这部作品如此的迷人、有趣,直接促使我在后续求学过程中从拉丁与古希腊语专业转而学习中国文化与历史研究。”(Jenner, 2016)其次,韦利对他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当外文出版社委托他全译《西游记》英译本时,他甚至写信给韦利,询问韦利是否介意他全译《西游记》。在他看来,“韦利所译《西游记》对他影响之深以至于他对韦利心怀感激。没有韦利的前译他是不会率先接下这个翻译项目”(Jenner, 2016)。随后韦利回信祝福他全译工作进展顺利。而正是有了韦利的这份祝福,他的《西游记》翻译工作就顺利多了。对于韦译本的影响,他也坦然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在开始翻译的时候,我就不再阅读韦利的译本。这并非不尊重他,而是因为非常尊重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我的译本和他的译本形成对比。我不想抄袭他的译文,但也不想有意努力回避他曾用过的语词。”(Jenner, 2016)

而从原文本主题以及形式定位这两个层面,也可见詹纳尔对韦利思想的认同与承接,以及沿着前者的思想所展开的续完实践。从文本主题方面来看,詹纳尔和韦利思想一致:否定了《西游记》是一部严肃的宗教文学作品,认为该文本是一部用以娱乐大众的通俗小说。“这本书中的佛学思想并不严肃。经文、佛祖名称经常出错。佛教韵文所含的教诲在明朝非常普遍,就像是欧洲那时的基督教思想一样普遍。”(Jenner, 2015:2340)而“16 世纪道家炼金术与炼金思想极为普遍。文内提到这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很难看出文内这些思想是严肃的”(Jenner, 2015:2341)。因此,他在翻译该文本时“无需在佛教与道家之间做出选择”(Jenner, 2015:2341)。而对于这些寓意,译者认为应该:“无论《西游记》传达了什么信息,最好就是不要担忧,只需享受这本书的智慧、幽默以及无尽丰富的观察和发现。如果读者从我所译的《西游记》中获得快乐,那翻译的这份辛劳就没有白费。”(Jenner, 2015:2343)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候,他也再三强调,这是一本为娱乐和消遣而写的书(Jenner, 2016)。因此,詹纳尔虽应出版社要求全译《西游记》,但和余国藩不同的是,他不仅未明晰化文内宗教主题思想,甚至采用一定的策略抹除译文的宗教题旨。例如把第 19 回中的“一主一宾无间隔,三交三合有玄微。心情并喜贞元聚,同证西方话不违”译作“One host and one guest with nothing to keep them apart,/ With the three in harmony they had a mysterious power”(Jenner, 2015:445)。这首诗运用五行术语来喻指取经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主宾是炼丹术语,铅作主,水银是客,在金克木的过程中,铅和水银充当主、客角色,而三交三合是指阴气阳气交合过程(Yu, 2016:719)。詹纳尔在翻译时候将主、宾译作常用词汇,三交三合译作三者和谐相处,如此以五行术语喻指取经人的道教深意被过滤。此种抹

除宗教寓意的翻译行为示例不胜枚举,如此删略文本宗教主题的翻译策略,就使得“读者不会因为大量解释佛、道、儒的注解而绊住”(Jenner, 2016)。

从文本形式来看,詹纳尔承接了韦利的立场,对文内韵文同样持轻视态度,认为这些诗词韵文并非是经典之作,而是语词堆砌的文字游戏。

说书人(《西游记》作者)没有时间进行长篇的描述,除非是以诗歌或歌曲的形式来增加娱乐性,在激动人心的时刻保持观众的悬念,或者评论正在发生的事情。小说中的许多诗歌段落是讲故事的延伸。作者用这些诗歌来尽情庆祝语言,堆积词语的热情让西方读者想起拉伯雷宏伟的词语积累。这些诗歌大多不是克制和含蓄的古典诗歌,而是有意夸大的文字游戏。在诗歌中,一切都被推向极致,但我们总能感受到作者在暗中发笑,他在堆砌这些效果时提醒我们,这只是一场游戏。他并不是在尝试写古典诗歌,而是使用了大众形式,并将这种描述性诗歌推进得远超一个说书人能够做到的程度。(Jenner, 2015:2333)

因此,在他看来,这些韵文并没有像伟大的诗作一样对译者有着无法实现的翻译要求(Jenner, 2016)。

在詹纳尔的翻译实践中,他虽然全译了韵文,并将韵文单列在散文之外,按照诗行进行文本空间排布,用以区分韵文与散文译文。但是就韵文本身而言,詹纳尔多关注意义层面的表达,而没有关注韵文的音韵形式的转换。对于是否要转换韵文的音韵特征,他在采访中表示,当他回去检查自己的翻译时,他发现译文的一个诗节押韵,对此他感到非常懊悔,因为“这是一本长篇小说,语言需要流畅,自然,不带强调的节奏,使读者不费力地翻阅一页又一页”(Jenner, 2016)。然而正如朱光潜在界定诗与散文区别时所言:“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朱光潜,2009:106)诗需要特殊的形式特征来标记自己的文体身份,如果韵文译文只做意义层面的凸显,那么散文与韵文相间的文体特色就徒有其形,其文学审美意义则荡然无存。因此,詹纳尔虽然全译《西游记》,但是所追求的是韵文与散文的无差别衔接,促使读者不关注任何的文体变化。这就使得散韵相间失去了特有的叙事形式产生的美学意义。

詹纳尔虽然应出版社要求全译了《西游记》,但是因对韦利翻译实践的高度认同,使得他采用了苔瑟拉式重译模式来回应韦利的影响。他依托韦利的成功模式,为自己翻译的全貌构建奠定了基础。这种续完式翻译模式下完成的全译本一直以来被视作是对韦利译本的补充,也是对《西游记》全景化理解的一个重要资源,读者群体也被设定为在看完韦利译作后,对这部作品全貌感兴趣的读者。通过这种重译方式,詹纳尔有效地扩展了作品的读者群体,使得更广泛受众能够欣赏并理解这一经典。

2.3 “克里纳门”式修正模式

克里纳门(Clinamen)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和罗马诗人卢克莱修

(Lucretius) 有关原子理论的术语,意指原子在下落过程中微小的偏移。该术语描述后来者在面对前辈作品的影响时,通过做出细微但关键的偏离,来体现创作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布鲁姆,2006:51)。如借用克里纳门来阐释重译实践,那么它可以理解为后译者并未大幅度偏离前译者,而是在接受前译者翻译思想时,进行细微但关键的偏离。这种偏离不是对前辈作品的彻底否认或完全脱离,而是一种微妙的改变,通过这种改变,确立自己独特的声音。英国著名汉学家蓝诗玲重译《西游记》时,就是采用了克里纳门式模式,在承认并接受韦译本对其影响的同时,却又进行微妙的改变,这种改变使得她的作品拥有了独特的身份。

蓝诗玲对前译者特别是韦利的翻译实践持肯定态度,但为实现新译本价值建构,从而采取了承接韦利的翻译观念,但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偏离。至蓝诗玲重译《西游记》时,这部作品在英语世界已经有三部颇具影响力的英译本——韦利、余国藩以及詹纳尔的英译本。蓝诗玲在这部译本前单列三页,以《翻译说明》(*A Note on Translation*)为题,强调了三位前辈对自己的影响。她坦言:

通过参考前面的译作,我受益良多。首先是 1977—1983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余国藩的全译本以及阿瑟·韦利的《猴》(1945)。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我重译。首先,语言变化。年代最近的全译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詹纳尔的全译本也已经有 30 年历史了,它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的。其次,对原文的长篇巨幅,全译本要分为四大册,这就使得节译本于老师、学生以及普通读者仍然是颇具吸引力的选择。韦利的译本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和活力。他的 Tripitaka(唐僧)之行如此知名,我仍旧照抄他的译法。但是他的译文删节却为重译留下空间。(Lovell, 2021:xxxvii)

蓝诗玲承接了韦利对文本主题的设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添加副标题、调整节译章节的方法,彰显复译本对韦译本的偏离。首先,蓝诗玲译本封面题名 *Monkey King* (猴王),而 *Journey to the West* 这一副标题则是被缩小置于封面上,本质上是对标题 *Monkey King* 这一人物形象作前景化 (foregrounding) 处理,突出猴的形象。在借鉴了韦利主题定位同时,通过添加“King”一词以及副标题来凸显二者之间的差异。其次,蓝诗玲对韦利翻译主题的继承与微小偏离还表现在对文本剪裁中。蓝诗玲译本共 36 章节,选译了 1~15、18~19、22、27、28~35、40~47、49、53~55、59~61、78~79、87、98、99~100 回的内容。其中 28~35、40~43、46~47、59~61、78~79、99~100 章回进行章节合并,以故事为单元收入到一个章节中。其他章节则是一个章节收译一个章回。韦利所选译的章回,蓝诗玲除 37~39 回《乌鸡国故事》略过不译外,其他都收入到自己的译本中。如此一来,蓝译本整体上延续了韦利的结构处理方法,新译本仍然延续了猴王故事开篇,并且因为关涉猴王成长的章回被全译,使得全篇的主题仍然紧扣猴王。其次,蓝诗玲虽然沿袭了以“猴”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但是

与韦利所塑造的勇敢、机智、灵活英雄式的猴王形象相比。蓝译本的“猴”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增添了“鲁莽”“遇事冲动”等消极形象特征(Lovell, 2015:xx)。再者,文内潜藏的宗教寓意在新译本中也被抹除,一方面,大部分的宗教寓言都潜藏在韵文部分,蓝诗玲删译了这些韵文,因此寓意也荡然无存。值得注意的是,蓝诗玲对中国古典叙事特征的处理方式也能表明她对韦利翻译的继承。例如,蓝诗玲省略了各回回目不译,如此就抹去了文本分回立目的特征。另一方面,她又保留了各回的说书人叙事手法,以此展露中国古典小说诞生于说书文化的这一历史渊源。

从文学形式来看,蓝诗玲对韦利的翻译也是一种继承与偏离。同韦利相一致的是,蓝诗玲在译本中也删去了大部分韵文。虽然没有如韦利一样从文学价值层面贬低这些韵文翻译价值,但是在《翻译说明》中,她指出:“为了叙事紧凑,把控叙事节奏,我删减了大部分用以装点情境、风景和打斗场面的描写性诗歌,除了一些与情节已然浑然一体的韵文。”(Lovell, 2021:xx)比如韦利在翻译第一回时留译的樵夫之词,蓝诗玲也留译了该韵文。但不同的是,蓝诗玲留译了第8~23诗行,译为:“I sleep till dawn then wander the wood, / Cutting creepers for my livelihood. / When I've gathered as much as I can hold, / I stroll singing through the market till it's sold...”(Lovell, 2021:6)从译文可以发现,同韦利在诗行处理所一致的是,蓝诗玲并未按照原文诗行排布译诗,而是将“一觉天明,认旧林”进行合并,从而使得第一行和第二行形成行尾的“wood”“livelihood”韵式,以此突出韵文的文体特征。此外,她还参照了韦利化韵为散的手法,将部分韵文融入到散文叙事中,形成一种平稳的线性叙事结构。总体而言,蓝诗玲在重译时也秉持了韦利的原则,即删除大部分韵文,以散体叙事为主,但却通过留译不同的韵文形成微小的偏移,以此构建重译本的独特价值。

结合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蓝诗玲在回应前译的影响时,采用承继式偏离行为。通过这一策略,重译者既尊重了前译者的贡献,又在具体的细节和整体风格上进行了创新,从而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和意义。

3 《西游记》重译者角色化过程分析

英国著名的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批评布鲁姆的焦虑理论时指出该理论有将文学作品抽离社会时代背景之嫌。文学作品应该放回到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仅靠弗洛伊德理论和俄狄浦斯情节支撑的焦虑理论忽视了社会文化要素对文学作品的影响(Eagleton, 2011:151)。上文的重译模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后译者与前译者之间的心理关系所导致的行为关系模式。为阐释这种心理、行为关系形成的原因,还需要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自2009年首次提出,已走过十余年发展历程,从最

初的“行为—会视域”“译者中心”“社会中心”双中心的评价系统,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互补(周领顺,2022:2),如今已经发展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上文从重译本文学主题与形式到人的行为模式分析业已完成了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分析,而下文则将从译者角色化,讨论影响译者重译模式的社会要素。译者角色化是译者为了使译文满足需要而调整 and 改变自己行为角色的社会性选择过程(周领顺,2014:219)。韦利之后的重译者之所以采用不同的重译模式和译者在翻译中所展现的多种角色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

余国藩之所以采用达耶蒙修正模式与其学者型译者身份有着密切的关联。余国藩在1956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赫顿学院、富勒神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从事宗教学方面的学习与研究。1969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专门从事西方宗教、哲学、文学方面的研究。在翻译《西游记》前,余国藩专攻宗教学视野下的文学批评研究,发表了《弥尔顿的史诗创作动机:论〈失乐园〉诗学神义论的形成》(*Milton's Epic Motives: on the Formative Principles of Paradise Lost as Poetic Theodicy*, 1969)之类跨学科研究论文。在日本籍导师的鼓励下,他又开始撰写了有关《西游记》的学术论文,谈论《西游记》的诗学价值、叙事结构以及宗教问题。横跨宗教学与文学的学者身份促使他正视原文本的宗教主题与诗学价值,由此促使他基于学术资源与学术立场质疑韦利翻译行为,并意图通过逆崇高来建构重译本的价值。

其次,詹纳尔的重译模式与政府机构译者这一身份有着密切的关联。1963年,他在汉学家、红学家吴世昌的引荐下,受雇于外文出版社,担任译者一职。如詹纳尔所言,这份工作职责在于“外事宣传”(Jenner, 2016)。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协议,英文版需要在原版发行之后尽快发布,抢在未经授权的外国翻译版之前问世。因此,詹纳尔受到外语出版社的委派,推出《西游记》的全译本,抢占国际话语权。因此,在政府机构职员这一角色作用下,按照机构意志进行全译实践促使他虽高度认同韦利的前译本,但仍然对其译本进行了续完式重译。

与另外两位重译者所不同的是,蓝诗玲是一位市场型译者。她虽然在伦敦大学担任教职,从事文学相关研究。但是在翻译《西游记》之前,她已经翻译了《马桥词典》《天葬》《中国证人》《我爱美元》《为人民服务》《色·戒》以及《阿Q正传及其它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等。前期译介作品中《色·戒》与《鲁迅小说全集》选入了企鹅经典丛书,由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发行。而蓝诗玲是受企鹅出版社的邀请,承接了《西游记》新译本的翻译工作。企鹅出版社自创立以来,是以高质量、价格亲民的平装书而闻名,发行目标是让文学和知识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韦利的译作《猴》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是经由企鹅出版社的全球推广,才逐渐收获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因此,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出版社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蓝诗玲的角色,促使她将大众设定为目标读者。因循韦利的翻译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偏离的克里纳门式修正模式成为她的选择。这种模式一方面保障了新译本以大众为目标读者,另一方面创造了新译本的价值。

4 结语

前译者占据时间优势,使得读者对原文本有了特定的情感以及审美期待,造成后译者处于前译者影响的阴影中。因此,与前译者相比,后译者不仅要考虑是否忠实于原作,还要考虑如何应对前译所建立起的读者审美期待,如何偏离这种审美期待,在忠实与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建构重译本在新时代的文学与文化价值,这是重译本能否跻身经典翻译序列的关键要素。值得肯定的是,无论是采用上文何种修正模式,重译者都是追求“同”与“异”之间的价值增长点,即如何实现忠实于原文本的同时,挑战前译本所建立的审美惯习,从而使得经典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在新时代得以延续与更新。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领域一直存在着重译泛滥的问题,同一文学作品出现了大量重复翻译的现象,从而导致一些消极效应的出现。首先,因为数量增加导致译本质量不均衡,影响了读者对作品的体验。其次,重译过多导致对原作的理解碎片化,从而稀释了原作文学与文化价值。再者,大量相似翻译版本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影响阅读兴趣与热情。重译本的出现不仅没有使得经典文本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反而促进了经典文本的价值衰竭。因此,如何以前译为参照,建构异于前译本的特征及文学价值,才是在概念厘定、动因分析之外重译研究亟需探讨的问题。对前译仔细研读、寻求重译本价值的生长点、赋予经典文本新的生命是重译者直面前译者影响焦虑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Eagleton, T. 2011.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Francoise, Massardier-Kenney. 2015. Towards a Rethinking of Re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Review* (1): 73-85.
- Jenner, W. J. F. 1993. *Journey to the West*, Vol. 1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Jenner, W. J. F. 2016. Journeys to the East, Journey to the West [EB/OL].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24-12-25].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journeys-to-the-east-journey-to-the-west/>.
- Lovell, J. 2021. *Monkey King: Journey to the West* [M]. London: Penguin UK.
- Poucke, V. P. 2020. The Effect of Previous Translations on Re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Russian-Dutch Literary Translation [J]. *Transcultural (Emotion)* (1): 10-25.
- Robinson, D. 2009. *Retranslation and the Ideosomatic Drift* [M]. Philadelphia, P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 Venuti, L. 2004. Retranslations: the Creation of Value [J]. *Bucknell Review* (47): 25-46.
- Waley, A. 1942. *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Waley, A. 1943. *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 [M].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 Yu, A. C. 2012.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Revised Edition*, Vol. 1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陈庆. 2022. “影响的焦虑”与诗学转向: 以湛约翰《花笺记》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研究(2): 52-61.
- 哈罗德·布鲁姆. 2006. 影响的焦虑: 一种诗歌理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晖. 2016. “情感之心”与水的象征: 亚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J]. 外国文学评论(2): 223-239.
- 刘晓丽. 1999. 名著重译贵在超越[J]. 中国翻译(3): 5-11.
- 刘珍珍. 2020. 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诗学的赋值[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104-110.
- 罗选民. 2016. 影响与焦虑: 谈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悲剧》的翻译[J]. 外语教学(6): 73-76.
- 荣立宇, 萧辉. 2018. 余国藩英译《西游记》诗词的音韵特征[J]. 东方翻译(5): 25-30.
- 王世钰. 2021. 译文影响下的译者屈从与焦虑探究[J]. 上海翻译(3): 13-17.
- 王文强. 2019. 倾听译者的心声——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1): 115-124.
- 吴晓芳. 2021.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研究的底本问题——以《西游记》为中心[J]. 中国比较文学(4): 97-115.
- 许渊冲. 1995. 为什么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J]. 外国语(4): 37-40.
- 余国藩, 李夷学. 2006. 《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朱光潜. 2009. 诗论[M]. 2 版.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周领顺. 2014. 应用翻译之译者角色化行为分析[J]. 当代外语研究(2): 21-24.
- 周领顺. 2022. 译者行为批评“行为—会视域”评价系统[J]. 上海翻译(5): 1-7.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Re-Translators of *Xi You Ji*

LIU Shenqiang LIU Zhenzhen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previous translations on re-translations, which can even lead to anxiety among re-translators, is an undeniable phenomenon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fter Arthur Waley, the re-translators of *Xi You Ji*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respond to the classic translation *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 and how to surpass this previous version. Anthony Yu, W. J. F. Fenner, and Julia Lovell, as three influential re-translators, adopted *Damonization*, *Tessera*, and *Clinamen* respectively in their translations of *Xi You Ji*, thereby constructing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ir re-translations. These re-translation model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role-playing processes of the three translators: academia-oriented, government-oriented, and market-oriented translators.

Key words: anxiety of influence; translator role-playing; re-translation behavior patterns;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责任编辑: 陈宁